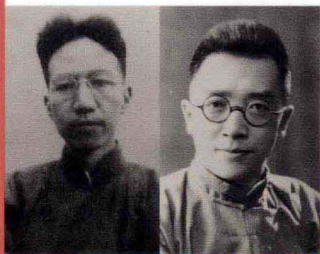


陈寅恪、胡适及其他

程巢父 / 著

思想时代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程巢父 / 著

思想时代

陈寅恪、胡适及其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时代:陈寅恪、胡适及其他/程巢父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7

ISBN 978-7-301-22082-5

I. ①思… II. ①程… III. ①陈寅恪(1890—1969) — 人物研究 ②胡适(1891—1962)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81 ②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6670 号

书 名: 思想时代:陈寅恪、胡适及其他

著作责任者: 程巢父 著

策 划 编 辑: 曾 健

责 任 编 辑: 陆淑慧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2082-5/D·3274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yandayuanzhao.com>

新 浪 微 博: @北大出版社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电 子 信 箱: yandayuanzha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117788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11.125 印张 246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再版前言

2004年4月,《思想时代》由华夏出版社选编出版。出版社嘱我请一位知名度高的学者写序,我便请长沙钟叔河先生劳神,因为他最了解我。

现在此书是前书的增订本:增加了不少新文章和《胡适遗墨笺注》图版多幅,可读性和观赏性较前略佳,入选的篇目均是自选。

钟先生现在已是八二髦龄的老者,我想让他处在轻松泛览、自由撰述而“无案牒之劳形”(如索序索评之类的额外文债)的佳境为好,故不便再请他为我的新书写序。九年前他写的旧序,仍沿用于新书。

程巢父

二〇一三年七月一日识

序言：为陈寅恪、胡适说话

■ 钟叔河

与程巢父先生相识之初，只读过他几篇谈武昌鱼和洪湖藕的散文。对名物的博识和考证工夫，散见于看似平淡却颇含趣味的记叙之中，且不乏婉而多讽之致，正是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后来才知道，写这类文章，不过是他的精神散步，不过是他作为调剂的一种消遣。

近年来他做的正经工作，如沈曾植研究等，都属于专门，非我这样不学之人所能置喙。但他发表在《东方文化》《书屋》和《文汇读书周报》上，如今又辑印成这一册的论陈寅恪、胡适的这一系列文章，面向大众为前贤说话，我却还看得懂。

陈寅恪和胡适的文化价值，半个世纪前早就有了共识。几十年之后，却还需要人来为他们说话，岂非笑话。不幸的是，笑话却成了事实。如果再倒回去二十多年，则为陈寅恪、胡适（尤其是胡适）说话亦不可能。光有这一条“罪名”，戴上“帽子”就有足够的条件了。

既要为前贤说话，便免不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免不了有所争辩。我不是一个好辩的人，不想在程君和别人之间来当评判。我以为只要都摒弃了“封建余孽”、“美国洋奴”这类“国骂”的影响，都能够实事求是承认陈寅恪和胡适的文化价值，便有了“求同”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尽可以各是其是，各说各话，这不正是陈寅恪、胡适他们终身追求的“允许别人

和自己不一样”的自由主义的真谛吗？

程君在为陈寅恪、胡适说话的时候，比较注意从他们的人格道德方面着眼和立言。《陈寅恪、朱延丰师弟关系及学风》一文中，详述了陈氏对自己的研究生朱延丰严格要求，甚至力主不派其出洋；但对朱失恋后“两个星期没上课，又不在宿舍住宿”却非常着急，派人各处去找；为了给朱找到“寄托”，还写信给胡适，推荐朱试译西洋历史书。后来朱延丰学业有成，原来被陈氏认为“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的毕业论文《突厥通考》，经过十年“详悉补正”，终于成书出版，陈氏又欣然为之作序。程君以充满感情的笔调介绍了“这一对清华师弟三十年代初在一桩具体事务的处置上所显露的学术精神”，接着又叙述了最近“在南方一所名牌大学里一位终身教授”及其弟子的故事。二者反差之大，对比之强烈，读了以后，使人不禁为五十年来知识分子人格的贬值和学术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悲哀，更不禁要掩卷深思其何以致此。这恐怕也就是程君用心用力写作的目的，体现了一种厚重的人文关怀。

“论人文”、“玩文化”，现在已经成了某些人的“时尚”。但程君决不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并不自作高明地来“论”，也不濠上观鱼似地来“玩”，而是把自己作为历史变迁中的一份子，学而思，思而学；故能于反思之后，深切感到胡适和陈寅恪的被批判，对于学术和文化，进而对于学术道德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实在有重大的影响，从而感到一种深切的痛楚，遂不能已之于言。他自己承认：

“我的整个少年、青年成长期，都是以他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以他人的眼耳当自己的眼耳的失知失觉期。迄于中年，通过阅读胡适，才知道梁（启超）氏‘新学说’对整整一代人的影响，才认识到‘改良主义’

岂可等闲视之……明白了‘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的陈寅恪，他所秉持的价值不是滞后而是超前的……”

我虽然也未必同意程君对陈寅恪和胡适的每一点认识，却不能不佩服他对前贤也就是对文化和学术自由、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深切关怀，并敢于为之说话的勇气。我以为，这一点比什么都更为难得。

陈寅恪“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与时务学堂故址（中山西路三贵街），和我家的距离都在四华里左右，那两处则相隔只有两里来路。光绪二十三年，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在长沙协助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等办时务学堂，常在通泰街家中和时务学堂间来往。此时寅恪已经七岁，其兄衡恪（著名美术家陈师曾）则已二十一岁，寅恪是很有可能由父兄带着到过学堂的。如今到处造“假古建”，湖南修“炎帝陵”、“舜帝墓”尤其热心，对于在近代化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务学堂故址却全未顾及。我曾在报纸上写过文章，建议将梁启超手书“时务学堂故址”六字，在中山西路三贵街口刻石留念，附近广场上则可建座浮雕，为戊戌在湖南办时务学堂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造像。陈三立的身后可以站着陈师曾，手里可以牵着陈寅恪，各人的名字可以刻在各人的脚下。这样岂不可以为长沙增一胜迹，实在比建朱熹、张轼的铜像有意思得多。这件事没有同程君讲过，如果征求他的意见，想必也会欣然表示赞成的吧。

目 录

- 1 说陈寅恪诗《答北客》
- 10 师风照弟品 正气养纯才——陈寅恪、朱延丰师弟关系及学风
- 18 人性人情总相通——就陈寅恪“话题”与止庵先生商榷
- 39 仁者之怀：陈寅恪爱弟怜才拾零
- 47 卞孝萱娱母 陈寅恪寄诗
- 53 二十世纪陈寅恪：冷落乎？厚待乎？
- 57 失落的人文精神
- 72 胡适的进步论——为纪念胡适之先生诞辰 110 周年而作
- 118 胡适从传统文化发掘自由资源
- 144 关于《智者千虑》所涉史实的辨正兼及学风
- 164 胡适重才济人之德
- 174 胡适与杜威——纪念五四运动及杜威来华讲学九十周年
- 184 关于胡适评价问题
- 189 胡适与京剧
- 199 张中行误度胡适之——关于林损对胡适怨怼的辩证
- 220 刘半农与胡适之间——就陈四益《乱言未能成一笑》一文提出实证

- 233 胡适来往书信又添一通——刘半农致胡适
- 240 王实味与胡适
- 244 又见胡适手札一通
- 248 储安平与胡适：两代自由思想——精英分子书信中的历史消息
- 297 胡适的集句联
- 301 胡适的“反悔”并非在 30 年之后
- 309 士气与正气——储安平致傅斯年的两封信
- 324 西南联大的民主习惯
- 327 学问与首长
- 330 周一良先生的《大方联语辑存》
- 334 实庵的书信
- 338 鯤西先生悼师
- 341 韦卓民先生的《纯粹理性批判》译本

说陈寅恪诗《答北客》

《答北客》是就汪钱 1953 年冬迎陈寅恪先生北上任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事而发。陈先生这首诗古典今典涵蕴很多层次，须以剥蕉见心的方法层层披解，始能贯通。诗的首句是：

多谢相知筑菟裘。

“菟裘”，地名。《左传·隐十一年》：“使营菟裘，吾将老焉。”这是鲁隐公回答羽父的话。服虔云：“菟裘，鲁邑也，营菟裘以作宫室，欲居之以终老也。”第二句：

可怜无蟹有监州。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国朝自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常与知州争权，每云‘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举动为其所制。太祖闻而患之，下诏书戒励，使与长吏协和，凡文书，非与长吏同签书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与通判不和。往时有钱昆少卿者，家世余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尝求补外郡，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至今士人以为口实。”第三句：

柳家既负元和脚。

典出刘禹锡《酬柳柳州家鸡之赠》：“日日临池弄小雏，还思写论付官奴。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牙斂手徒。”出典背后还有出典，如不将古典层层弄清，则解陈诗难以达到贯通贴切和周全。

刘禹锡在写上述诗以前，曾请柳宗元指导他两个儿子的书法，柳则为之写成帖本，同时又写了一首诗一并附去，诗题是：《殷贤戏批诗后，寄刘连州并示孟仑二童》。殷贤可能是柳、刘二人共同的朋友，“戏批书后”说明彼此很熟，也很随便，属同辈文士。孟仑二童是刘家子弟。在诗题下面，柳宗元自注云：“家有右军书，每纸背庾翼题云‘王会稽六纸，二月三十日。’”诗云：“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劳手自题。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已厌家鸡。”这是一首文人间开玩笑的打油诗。据《柳集》旧注：“王僧虔论书云：‘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分，在荆州与都下人书曰：小儿辈贱家鸡，皆学右军书，须吾还叱之。’旧注又解其题曰：《因话录》云：‘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犹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以此观之，盖有之矣。’”诗的原意以庾翼指禹锡，“手自题”，谓禹锡见之必自加品题。“厌家鸡”两句意谓禹锡书法造诣本不浅，何必远求柳的指授呢？

现在再回头看刘禹锡酬答诗的首句：“日日临池弄小雏”，“小雏”指孟仑二童，全句是指导儿子攻习书法。次句：“还思写论付官奴”，王羲之有女名官奴；此时柳无子，故禹锡以此戏之。第三句：“柳家新样元和脚”，“元和脚”喻元和年间的一种新诗文风格，《苕溪渔隐丛话》引《复斋漫录》云：“有‘柳家新样元和脚’，人竟不晓，高子勉举以问山谷，山谷云：取其字制之新，昔元丰中晁无咎作诗文极有声，

陈无己戏之曰：闻道新词能入样，相州红缣鄂州花。盖相州缣、鄂州花也。……则柳家新样元和脚者，其亦类此欤？余顷见徐仙者效山谷书，而无己以诗寄之曰：蓬莱仙子补天手，笔妙诗清万世功。肯学黄家元佑脚，信知人厄匪天穷。则在山谷之言无可疑。最后见东坡《柳氏求笔迹》诗：君家自有元和手，莫厌家鸡更问人。其理相同，但手字为异。”据此，则“元和脚”乃喻柳的书法，盖柳书必具新颖独特之风格。第四句：“且尽姜牙敛手徒”，意谓：柳家既有“元和脚”，则我只有袖手旁观了，还有何资格指导官奴（指柳的女儿）呢？——“还思写论付官奴。”

再补释“家鸡”。因王羲之爱鹅，故庾翼说“小儿辈厌家鸡”，家鸡即指本家书法。陈师道也曾以庾翼事作诗云：不解征西诸子弟，却怜野鹭厌家鸡。至此，我们可以了解《答北客》第三句的用典了。“柳家”所指极明。“元和脚”喻学术自由。1948年，当国共两党在内战战场上已呈明显态势之始，知识分子便普遍地起了恐慌，张东荪（时任民盟秘书长）便在《展望》周刊上撰《告知识分子》一文安定人心。他说：“近几个月来，平津宁沪以及其他各地的知识分子，普遍地恐慌起来了。……这个现象使我非常奇怪。按理我以为知识分子不应该恐慌，即是用不着恐慌。”张氏总结知识分子恐慌的心理有三点：一是怕被清算；二是怕丧失学术自由；三是怕社会变了，有些知识变为无用，而失去薪水地位。张氏一一加以解释疏导。他说：“如果有人以为将来社会大大变化了，便使有些知识变为无用，而靠此种知识为生的人即失去其薪水地位，我以为这个顾虑亦不见得正确。姑以学死言语的为例，如治拉丁文、希腊文、梵文的人，苟其将来还要全部文

化，则这种人仍有用处。”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旋即转载此文（第四卷第十四期，1948年5月29日）。尽管此前毛泽东曾向哈里森·福尔曼宣称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上“我们不想像苏联那样趋于极端”，又在《论联合政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呼吁“在全国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并且斩钉截铁地宣布：“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卓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但是陈寅恪却没有张东荪那样乐观，他仍然怕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于是在张东荪《告知识分子》之后，他为自己预谋了南方寄命之地（1948年夏）。

几个月以后，张东荪又写《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的长文（《观察》第5卷第11期，1948年11月6日），再次申论他认为文化的自由不会丧失的观点。他说：“依照我个人的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与诊断，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地位，……不但不必怕被清算，而且还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但是，这些乐天派的“民主阵营”的“进步”人士在高兴中国终于“天亮了”，他们受到了短暂的尊重与优待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同时，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1950年5月20日）。接踵而至的便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9月发轫）、“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12月）……1952年的院系调整，法律系与社会学系停办，经济学系改政治经济学系，废除西方

经济学，心理学被视为宣扬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学科；清华大学改为理工大学。1948年知识分子的担心终于兑现。苏联专家充塞于自然、人文、社科各学术部门，1953年又开展了全国的“中苏友好月”活动，唯老大哥马首是瞻已成事实，陈寅恪的担心亦已兑现。“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业新书”，他亦敏感地感触到文化的变迁，遂有“而今举国皆沈醉，何处千秋翰墨林”之叹。综此所略举之梗概，皆可作“既负”之注脚。陈寅恪曾对黄萱说，诗必须有两个以上的意思，才算好诗。此句在字面以下又埋藏了一个暗典，即尊处既有“家鸡”当道，何必来“怜”我这“野鹜”呢？现在再看第四句：

不采苹花即自由。

此句典出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象县，柳州县名。当时柳宗元在柳州。诗云：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此二句写曹侍御过象县）。春风无限潇湘意（此写曹“见寄”，不忘故人），欲采苹花不自由（谦辞，意谓除了以此诗酬曹，别无更好的物品以表敬意）。“采苹花”典出《诗经·召南·采苹》：“于以采苹（在何处采苹？），南涧之滨（南涧的水滨）；于以采藻（在何处采藻？），于彼流潦（在那流潦）。”笺：“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工，教成之祭，牲用鱼，芼用苹藻，所以成妇顺也。”这是说贵族妇女在出嫁前所受的各种教导。另外还有一条关于苹与藻的注释：《左传·襄二十八年》：“济泽之阿，行潦之苹藻，置诸宗室，季兰尸（祭祀）之，敬也。”此谓苹藻为祭祀品，以表诚敬意。于是我们可知“采苹花”有两层含义：《诗经·采苹》这篇诗歌作品本身是“召南大夫之妻，

娶异国之女，推其在家教成而祭之时而言”（王氏《集疏》）；而它的背景情况是：贵族少女嫁前受教。“采苹花”的另一层含义是：教成，采苹花作祭祀品，表虔敬意。柳宗元诗的用典是取后一含义。陈诗第四句“不采苹花即自由”改柳诗“欲采苹花不自由”原意而用之，柳诗用典是单义，取致敬不取受教，而陈诗是复义，字面意义是“不受优待”（任所长）——“不采苹花”——而言外之旨是“不受管教约束”，便能保住“自由之意志”，从事我的著述。以第四句与第二句相参，“无蟹有监州”，“无蟹”喻不能尊重学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自由研究学术的条件；“有监州”喻重重管束、限制。

以上将《答北客》的用典、命意弄清楚了，再来看看陈先生当年的思想、观点对不对。陈先生《对科学院的答复》所提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

这里用两个具体的实例来验证陈先生的观点。在《积微翁回忆录》1951年10月14日条保留了一条记载：“晚，夏作铭（鼎）来，……言马学良出版一兄弟民族语著作，序文录一歌颂法国教士碑文。书出后陆定一发现不合，郭沫若、罗常培皆自行检讨，收回赠本。以此近日出版事愈慎重云。”当时对待任何事物，首先强调“站稳立场，端正观点”，然后再用“端正”了的观点去观察、判断事物，则势必难以端正，多与实事求是相悖。马学良书中序文事，就在于先有了：“洋人的一切非武力活动都是文化侵略，都该否定”这个固定的观点，遂不问事实如何，导致“收回赠本”，郭、罗检讨。在一个知识分子动辄“出

错”检讨的气氛下研究学术，则可想治学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还有一个实例就是当年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老资格的马列专家权威艾思奇，60年代初曾经否定、批判过电子音乐，他认为音乐不由人演奏而生音响旋律，反由电子操纵，是“西方音乐殁落的反映”。其实他是从新闻报导中获得的了解，既未见到实物，亦未临场观听演奏，殊不知电子音乐仍须由人操纵演奏。如今电子音乐风行世界，他就犯了既不“唯物”，又不“辩证”的毛病。至于在他下下的一般对马列理论生吞活剥的耳食之徒在各个学术领域所犯的片面性毛病则举不胜举。用这两个实例可以说明陈先生提出第一条的理由。陈先生在宣统三年就通读了《资本论》原文，他申明“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他是个不直接涉入政治的纯粹学者，这是前提。一种学说，即使是重要的学说也应允许人们有选择的自由。陈先生在40年前读《资本论》原著就是自由选择。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以来的一门值得重视的学说，知识分子不会熟视无睹。陈先生的观点，只因不合时宜，便被视为出格和不合情理；不合时宜的事物，并不等于错的或毫无价值的事物。他以他深厚、广博的历史学和人类文化知识为参照系，去审视判断客观事物，往往无不射中鹄的，因此他有勇气、有坚定的信念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他被身后的几代学人所敬服的地方。

汪篋携郭沫若、李四光两封信衔命南下迎陈是在1953年11月中旬，迄12月上旬迎陈失败，铩羽而归。此后又有李一平的赴穗说迎。这一条事实我是在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见到的：“据父亲《日记》载：政府还曾派寅恪伯父的旧识，国务院参事李一平来迎，‘寅格说明宁居中山大学，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

礼’。”（第133页）翌年1月16日，郭沫若又亲自驰书促驾。从这些迹象可以揣度当年的一些情况。一是科学院从北京大学和国务院参事室借人南下说迎陈氏，反映了迎陈北上之难。此前必以书信有所试探、接触，遭到婉却。二是陈先生既为当代中古史第一学者，如不北上就任所长，则中古史所名实难符，且难与彼岸之史语所相抗衡，于新政权之最高学术机关亦少光彩。三是迎陈有周公的指示，亦是学界众望所瞩，科学院有自上及舆论的压力。这里要讨论的主题是“北客”属谁。汪钱、李一平都是局外人，只是充当临时说客，不是主事者，与“筑菟裘”无关，虽是北来之客，均可排除。郭沫若虽然迭函敦请，但陈先生1954年1月23日的覆书是这样写的：“沫若先生左右：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手书敬悉。尊意殷拳，自当勉副。寅恪现仍从事于史学之研究及著述，将来如有需要及稍获成绩，应即随时函告并求教正也。”（《吴宓与陈寅恪》，第133页）陈先生以一个学人的礼貌与风度，让堂堂郭院长碰了一个软钉子，使用的是不卑不亢极有分寸的“外交辞令”，因此《答北客》这样的诗随信附去是极不可能的，故答郭的可能性亦能很容易的排除。至于李四光呢？从“相知”两字判断，李于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陈于同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二人同在一所研究院任职，又都当选为1948年的首届院士，故从以上所列人选的资格来遴选，“相知”之称，唯李氏一人足以当之无疑矣。《答北客》的最先披露是在《积微居友朋书札》一书中。这是1954年7月10日致杨树达的一封信，诗前有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去冬有一短诗，附呈以博一笑”。“畏人”指“监州”之人，亦指经“洗澡”“换脑”之人。“畏寒”亦堪